

强制、资本和 欧洲国家

(公元 990 — 1992 年)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 1992

CHARLES TILLY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强制、资本和 欧洲国家

(公元 990 — 1992 年)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 1992

CHARLES TILLY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美)蒂利(Tilly, C.)著;魏洪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2

ISBN 978-7-208-06907-7

I. 强... II. ①蒂...②魏... III. 欧洲-历史-研究-990~1992 IV. 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776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公元 990—1992 年)

[美]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283,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907-7/D·1192

定价 30.00 元

作者简介

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是兴趣广泛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是研究欧洲政治变化的权威，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特聘的约瑟夫·L. 伯滕威泽 (The Joseph L. Battenwieser) 社会科学教授。他 1958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蒂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自己所说的终生的三大关怀上，它们是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他特别关注大规模的社会变化及其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发生在 1500 年以来的欧洲的社会变化。他对欧洲历史考察入微，对许多政治现象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著述丰硕，也是政治学领域著名的学者。

**纪念聪明的热心人、管理者、
创造者和朋友斯坦·罗坎**

中文版序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并没有试图去覆盖整个世界历史,也没有提供一个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地的国家演化的模式。它致力于这个具有充分挑战性的工作,即解释从 990 年(欧洲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处于边缘地位之时)到 1992 年(欧洲及其周边地区持续两个世纪的霸权显然开始动摇之时)的欧洲国家形式的转化和演变。本书偶尔提及中国,但主要是为了指出欧洲经验中的不同之处,而非出于系统比较和解释的目的。

本书主要承继并修正了更早时期的一次集体努力。1975 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作者有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加布里埃尔·阿丹特(Gabriel Ardant),鲁道夫·布朗(Rudolf Braun),戴维·贝利(David Bayley),彼得·伦德格林(Peter Lundgreen),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和我;我还担任了该书的主编。那本书是对当时常见的用诸如“现代化”、“政治发展”之类的观点,用目的论的方式解释国家变迁的倾向的反击。那类观点不仅消除了不同国家的历史道路的差异,模糊了它们的起源,而且暗示着:那些走着与当今世界主流国家不同路线的国家是不太发达的,而且它们最终或者重演西方国家的经历,或者永远落在后面。

我们小组将精力集中于用实际的西欧国家史来回应上述一系列错误观点。实际的西欧国家史过去常常被当作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和那些模式相反,我们仔细地考察了许多镇压、榨取、控制和冲突的过程。总之,我们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那些被其他人视为通过较高的国家机构有

意地解决问题的史实:我们将之描述成对权力的争夺,而国家正是这种权力争夺的副产品。我们也比通常更多地关注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作为孕育所有具体国家历史的母体(matrix)的地理政治。

我们在这方面的大量灵感都来自我们的合作者之一,斯坦·罗坎。我谨以该书的1992年版来纪念他。罗坎是一位挪威政治科学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追求两个明显矛盾的智力目标。一方面,罗坎力图去理解地方政治(包括他出生的斯堪的那维亚)中的分裂及意识形态的细节。另一方面,他描绘了综合时间和空间的辽阔的欧洲政治地图,在其中法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只不过是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罗坎通过把地方历史看成对涉及更大范围(甚至是横跨大陆的)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创造性回答,把这两种显然矛盾的努力综合到了一起。这种观点应该对中国学者有吸引力,他们不可避免地地方历史部分地理解成为和帝国、世界经济相联系的产物。

1992年的版本修正了1975年版的一些缺点。无意之间,作为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反动,我们1975年的小组形成了某种反理论。在发展理论强调有意识的计划和解决问题的地方,我们的反理论则强调强制和冲突是政治变化的动力。这使得我们的论点有很大的解释价值,但是这也使我们不必要地陷入了认为国家形成取决于在国家层面上集中武装力量的单一途径的观点。《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通过有意识地讨论强制在欧洲国家形成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方面的差异,以及通过更多关注资本积累的不同作用来纠正这种错误。在一本篇幅不长的书籍中覆盖上千年的历史,其结果依然是提纲挈领的,但是肯定会比对强制、冲突和国家创始的平铺直叙要复杂得多。

此书对研究中国长期的国家演化的学生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差异。作为有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延续了约两千多年的统一国家;作为有着丰富多彩的原创文化的历史和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拥有地球上最庞大的武装力量的国家,中国对研究国家演化的学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挑战有四个主要含义。第一,中国仅幅员辽阔和历史悠久就让其他政权相形见绌,以致所有分析者都不知道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进行什么样的比较才有意义。例如,我们是否应该放弃把中

国和本书中描述的其他小得多、时间也短得多的国家进行比较,只是为了比较 a) 整个大陆或者 b) 大帝国和它们的后继者? 和什么其他的历史,我们才能合理地、有益地比较中国的政治史?

第二,尽管有不断发生的反叛、征服和内战,绵延不断的中华帝国不知怎么地通过文职官员(他们和所控制的人口按比例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之低)统治着这个次大陆——大多数时间只有一到两万帝国官员,这意味着比每 1 000 个帝国臣民一个官员还要少。帝国是怎样实现这管理奇迹的? 然而,以同样的方式,是否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经历了从 1911 年到 1949 年的漫长奋斗之后,也设法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以大约相同的规模重新实施中央控制? 中国长期的由上而下的控制的经验的特色是什么?

第三,中国国家近来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强制和资本(借用本书标题中的关键术语)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何暗示? 在欧洲历史中,我们能够合理地把国家经营的军事力量的创始和商业资本的形成描述成部分独立的过程。在所对照的欧洲地区和欧洲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些过程有着不同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诸如中国武装力量在最近几十年里在商业——企业的创始和运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些现象?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尽管中国国家的武装力量庞大,但自从最早的中华帝国开始军人通常就服从文官控制? 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强制和资本在中国已经融合在一起? 或者至少已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经验中常见样式的相互作用的形式?

最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的重新崛起对于本书中所说的“国家体系”有何暗示意义?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大国及其殖民地附庸(colonial offshoots)一直称霸世界国家体系,不仅在全球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建立了广受模仿的国家组织模式和主要大国间的关系模式。我们是否应该把中国的崛起简单地看成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权力的又一次转移? 或者看成一次体系特点的根本转变? 我们是否应该期望中国的强大和繁荣会带来一个国际关系的全新时代?

我并不企望你面前的这本书能立即回答上述四个深刻的问题。然而,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思考上述问题的便捷方式。例如,本书的最后一章,为欧洲之外的国家和本书所考查的千年欧洲历史之外的国家的演化

提出了这些有用的假说:

- 强制和资本的相对分布对国家演化道路(不管这种演化发生在哪里)的重大影响;
- 有无大城市群的显著不同的变化方向;
- 战争和准备战争对国家结构的创造和改变的强烈作用;
- 通过 a) 财政结构和 b) 武器和军事人员的来源对上述作用的思考;
- 国家权力通过创造中央官僚政治的市民化,日益增长的对用于购买军事手段的信用和税收的依赖,以及和臣民们就这些手段的讨价还价;
- (1992 年后的时期)国家组织形式的从“内部”决定到“外部”决定的趋势的持续。

这些对于从 990 年到 1992 年的欧洲历史的概括并不足以当作规律。但是它们在欧洲史方面则是非常可靠的,在作为和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进行比较的初始假说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有些概括在和其他地方比较时结果不对,那就更好(*so much the better*):它们将起着指证欧洲国家演变的特点的作用,从而可用于澄清进一步比较的术语。我最大的希望是,中国学者做出的严肃的历史比较工作将不仅刷新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也能刷新我们在全世界时空范围内对国家演化的理解。

查尔斯·蒂利

2007 年 4 月于纽约城

英 文 版 序

创造性神经病,我称之为把一个人的强迫症和恐惧症引向丰富结果的艺术。本书展示了这种艺术在写作中的应用。在本书中,我的希望从复杂事件中发现或创造简单对称性的强迫症,和想通过承担另一项不太困难的任务来逃离沉重责任的冲动交织在一起。在本书中,任何一位读者都不难看出追求秩序和简单化的强迫症的迹象。然而对于后一冲动,我要稍加解释。以前有很多次,为了避免一些痛苦的或者困难的工作,我却投身到了另一些困难的工作。这一次,在和温·布洛克曼(Wim Blockman)合作征集文章编辑有关欧洲城市和国家相互作用的论文集之后,我开始着手一部格外“野心勃勃”的,比较公元1000年后的欧洲的几个地区的具体的城市和国家的之间联系的著作。

我希望此书能充分地回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s)的挑战:“今天,当‘来自下层的历史’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的口号,并且给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带来了比较大的收获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世俗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上最终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只要阶级存在,正是国家的建构与解构保证了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最基本的转变。”(Andersons 1974:11)我希望此书能将我终生的三大关怀融为一体:它们是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这样一本书,需要熟练掌握陌生的(exotic)资料 and 语言,更不用说要一步一步地编辑宏大的目录和统计资料。我开始

了写作,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忙于在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寻找新的资料,而且在学习新语言和捡回旧语言方面考验自己的能力。康奈尔大学 1987 年的信使讲座(Messenger Lectures)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检验本书中所形成的某些观点;尽管伊萨卡岛(Ithaca)的讨论证明了这些观点是多么的粗糙,但是它也使我认识到这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值得为它作出长期的努力。

当我在 1988 年 2 月和 3 月致力于本书的写作时,我在巴黎的政治研究院(d'Etudes Politiques)开设了一系列的讲座[我感谢阿兰·兰斯洛特(Alain Lancelot)和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为我安排了这次机会,而且要感谢克莱门斯·赫勒(Clemens Heller)为我争取的人文科学院(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对我在法国期间的资助]我原计划在讲学之余利用一下巴黎档案馆。但是在讲座系列之初我又讲到了欧洲的城市和国家。当我思考报告所引起的生动提问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有另一本书可写:一本比我手头已经开始写作的那本书更加提纲挈领、更加综合、更加简明、更加实用的书。写作这样一本书将给我以借口从那艰难的宏大计划中体面地(如果说是暂时地)抽身出来。我没有去档案馆,而是在住所的键盘边开始兴奋地写作新书。我把在康奈尔大学和研究所讲学的修改稿都纳入了这个计划,因此当我在 3 月底回到纽约时,我已经完成了本书主要部分(main chunks)。

暂时放下了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慷慨资助的一年休假的其他计划,我在电脑边“奋笔疾书”。[在此期间,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波林·罗思坦(Pauline Rothstein)和她的助手在图书馆资源方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聪明的帮助,卡米尔·耶齐(Camille yezzi)在日常工作方面提供了便利,埃里克·万纳(Eric Wanner)和彼得·德雅洛西(Peter de Janosi)提供了友好的支持,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维瓦纳·泽利泽(Vivaana Zelizer)则鼓励我去研究大框架、大过程和大比较。]到 1988 年 7 月,一本完成了(如果说还是不平衡的)的手稿开始流传。那本手稿以及后来几稿依次以书名《国家-强制和资本》、《白银-刀剑和权杖》以及不太甜蜜但更为准确的书名《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流传。本书的现在这一版包含和选用了以前出现在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伦纳德·霍克伯格(leonard Hochberg)编撰的

《1500年以来的欧洲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European Stage making and Capitalism Since 1500)、《历史中的地理透视》(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History)(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当今世界的战争制造者和市民》(Warmakers and Citize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CSSC(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Working Paper 42, 1987)、《战争如何导致国家以及国家如何导致战争》(How War Made States and Vice Versa)(CSSC Working Paper 42, 1987)、《国家、强制和资本》(States, Coercion, and Capital)(CSSC Working Paper 75, 1988)和《法国的国家和反革命》(State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Social Research* 56 (1989), 71—98 中的材料。]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朋友和同事阅读过或听说了本书的不同片断;我不断地要求讨论和修改,使得他们繁忙不已。珍妮特·阿比—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温·布洛克曼斯(Wim Blockmans)、布鲁斯·卡罗特斯(Bruce Carothers)、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布莱恩·唐宁(Brian Downing)、卡门扎·加洛(Carmenza Gallo)、托尔瓦尔德·格兰(Thorvald Gran)、马乔林特·哈特(Marjolein't Hart)、彼得·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安德鲁·科比(Andrew Kirby)、约翰·林(John Lynn)、佩里·马斯(Perry Mars)、马特恩·普拉卡(Maarten Prak)、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韦恩·特·布雷克(Wayne te Brake)和翁宾(Bin Wong)给了我难以估量的帮助:他们仔细地审阅了前几稿的整个手稿,而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乔·赫斯本兹(Jo Husbands)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在某些具体的部分添加了尖锐的评论。我应该深深地感谢阿黛尔·罗特曼(Adele Rotman)的关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明白易懂的建议。尼基·阿杜巴(Nikki Aduba)用尽善尽美的细心和智慧编辑了该书的手稿。当我致力于本书时,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正忙于完成她自己的著作,但是她非常大度地容忍了我的“废寝忘食”,并给予了策略上的建议。

伯根(Bergen)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Irvine)分校、芝加哥大学、日内瓦大学、莱登(Leiden)大学和西渥太华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哥伦比

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爱沙尼亚科学院的听众对部分的分析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新校(the New School)关于国家形成的研讨班以及他们集体的活动在阐述本书论点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深深地感激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他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同伙们(co-conspirators)[特别是莉萨·安德森(Lisa Anderson)、戴维·坎那戴恩(David Cannadine)、马丁·加吉乌诺(Martin Gargiulo)、丹尼斯·杰克逊(Denise Jackson)、杰拉尔斯·马韦尔(Gerals Marwell)、萨尔维多·皮特鲁茨泽诺(Salvatore Pitruzzello)、凯特·罗伯茨(Kate Roberts)、赫克托·沙米斯(Hector Schamis)、卡莫尔·谢哈迪(Kamal Shehadi)、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克莱尔·厄尔曼(Claire Ullman)和罗南·范·罗塞姆(Ronan Van Rossem)],他们组织了愉快的讨论会来仔细检查本书手稿中的某些章节。在这些大力帮助的批评者中还没有一个人阅读了本书这一版本的所有手稿,因此他们也没有必要为我的错误负责。

错误当然在所难免。跨越上千年,我毫无疑问会忽略某些重大观点,遗漏某些关键事件,忽视某些重要矛盾,搞错某些重大事实,以及错误地解释某些变化。我只是希望读者能指出我的错误和疏忽,希望他们在立刻拒绝本书之前思考一下我的那些错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总体论点。我乐观地希望本书会继续已故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开始的工作,希望它能积累力量并纠正斯坦和我合作的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中的错误,希望本书会成为我在早期著作中曾经倡导的在历史基础上探索大规模变化过程的研究方案的范例。这些早期著作有《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和《当社会学遭遇历史》(*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我还希望本书能继续致力于历史偶然性的理论。说明历史偶然性理论的有 Anthony Giddens, Allan Pred, Arthur Stinchcombe 和 Harrison White 的近作。果能如此的话,强迫和恐惧症会再度对知识作出建设性贡献。当然,我面临的问题是:大部头的著作仍然在等待着我。

查尔斯·蒂利

目 录

中文版序 / I

英文版序 / V

第一章 世界历史中的城市和国家 /1

第一节 历史中的国家 /1

第二节 现有的答案 /6

第三节 资本和强制的逻辑 /19

第四节 战争促使国家形成和转变 /22

第五节 长期的趋势和相互作用 /32

第六节 展望 /37

第二章 欧洲的城市与国家 /42

第一节 欧洲形成之前 /42

第二节 国家和强制 /49

第三节 城市和资本 /52

第四节 城市和国家的相互作用 /56

第五节 国家生理学 /59

第六节 危险的关系 /64

第七节 国家的另类形式 /68

第三章 战争如何促成国家以及国家如何导致

战争 /74

第一节 暴力的分野 /74

第二节 国家如何控制强制 /76

第三节 战争 /78

第四节 过渡 /84

第五节 夺取、制造或者购买强制 /93

第六节 偿还债务 /97

第七节 帝国结实的长臂 /101

第四章 国家及其国民 /106

第一节 从黄蜂到火车头 /106

第二节 讨价还价、权利和集体行为 /109

第三节 直接统治的机制 /114

第四节 法国革命：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 /118

第五节 国家扩张、直接统治和民族主义 /126

第六节 未意料的负担 /129

第七节 军事化=平民化 /134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谱系 /140

第一节 中国和欧洲 /140

第二节 重新审视国家和城市 /144

第三节 强制的轨道 /151

第四节 资本主义的轨道 /158

第五节 资本化强制的轨道 /167

第六章 欧洲国家体系 /179

第一节 欧洲国家的联系 /179

第二节	战争的目标	/184
第三节	该体系的成员	/189
第四节	国家联成的世界的形成	/203
第五节	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206
第六节	六个突出的问题	/209
第七章	1992 年的军人与国家	/214
第一节	政治的歧途	/214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遗产	/219
第三节	军人的崛起	/226
第四节	历史视野中的今日军队	/228
第五节	军事的积累	/232
第六节	掌权的军人	/235
第七节	军人如何获取权力?	/241
第八节	结束语	/248
参考文献		/253
译后记		/295

第一章

世界历史中的城市和国家

第一节 历史中的国家

大约 3 800 年前，一个小小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的统治者征服了这个地区的所有其他城邦国家，并使得他们臣服于他自己城邦的神——马杜克*。巴比伦的统治者汉谟拉比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至高无上的国王。通过征服，他获得了为所有人制定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在他著名的法律的前言中，汉谟拉比声称受到来自伟大的神祇阿努(Anu)和恩利尔(Enlil)的教诲：

阿努和恩利尔召唤我把安宁赐予人民，
我，汉谟拉比，恭顺的、畏惧神灵的王子，要使正义出现在大地，
要消灭邪恶和坏人，使强者不能伤害弱者。
我像太阳一样升起，普照黎民百姓，
照亮整个大地。(Frankfort 1946:193)

在神圣召唤的伪装下，汉谟拉比可以满怀信心地把那些反对其统治的人称为“邪恶”和“坏人”。他诽谤受害者，消灭异己联盟，夷平敌手城

* Marduk, 古代巴比伦人的主神，原为巴比伦的太阳神。——译者注